

復旦 外國語文學 論叢

復旦大學外學院

春季號 研究生專刊

(Postgraduates) Spring, 2008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08 年春季号研究生专刊)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08 年春季号. 研究生专刊/张冲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309-06063-8

I. 复… II. 张… III. ①语言学-外国-文集②文学研究-外国-文集
IV. H0-53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2467 号

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 2008 年春季号. 研究生专刊

张 冲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庄彩云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347 千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063-8/H · 1210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编 委 会

主编：张 冲

本期执行主编：张 冲

编委(按姓氏汉语拼音
为序)：

蔡基刚 何刚强

黄勇民 姜 宏

姜银国 陆谷孙

唐 敏 曲卫国

沈 黎 谈 峥

魏育青 熊学亮

张 冲 褚孝泉

朱永生

外国文学研究

浅析《我的安东妮亚》中作者自身对不同角色个性的

投射 武泽明(3)

《湿地》中的哥特式元素和主题 任 战(9)

茨威格《马来狂人》权力结构分析 姚轶励(17)

组合的世界与聚合的世界

——小说《窥视者》的结构及其意义 张琳敏(24)

酒神的献祭

——论《威尼斯之死》中的神话语境 柏 栎(32)

论《大个子莫纳》的互文性 缪伶超(40)

从“扁平”走向“丰满”

——浅析莎翁笔下的理查三世 罗 瑜(45)

从后现代小说的解构特点看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赵舒静(51)

《爱玛》：波浪式结构中的反讽 向丁丁(58)

“无意思”中的意趣

——评爱德华·李尔的图绘五行打油诗 曾敏昊(64)

施尼茨勒《艾尔丝小姐》中的内心独白 董勤文(69)

横光利一《机械》与鲁迅《狂人日记》之“狂人”的不同

..... 黄略明(78)

语言学与教学研究

巴赫金“权威话语”及“内在劝说话语”的应用

——“保卫上海话”之争的社会语言学解读 张雪波(87)

小议现代语言学研究对索绪尔语言观的阐释与继承

..... 熊 况(94)

英语“予格转换”结构的二语习得研究 李烨霖(99)

浅谈新格莱斯回指理论 张晓雪(112)

语境:言语幽默的源泉

——试用动态语境观对言语幽默进行语用阐释	曲春燕(121)
词汇语用学视角下的一词多义现象研究	林晶晶(129)
一语概念迁移和二语概念流利习得	江 静(136)
韩国语入门发音教育方案	
——以中国学生为对象	李松月(142)
韩语汉字词和汉语词同形异义的对比研究	过淑娴(150)
汉语“吃”与韩国语的对应关系考察	何璐璐(164)
以原型理论为基础对比分析多义词“보다”和“看”	刘成杰(170)
汉语“致使”义兼语句与俄语使役句比较初探	
——界定及范围、语义分类及表现形式	朱珍琦(178)
俄语语义空泛词及其功能特点	沈 健(186)

翻译研究与辞典编撰

浅析《英汉大词典》(第二版)词和短语层面的语用信息情况	朱绩崧(195)
文学翻译的妥协与再创造	姜渊卉(202)
试谈古诗英译中的“标准”	韦春晓(208)
从外来词翻译的变迁看归化与异化	杨 宁(215)

外国文学研究

浅析《我的安东妮亚》中作者自身 对不同角色个性的投射

武泽明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摘 要: 在《我的安东妮亚》中,作者威拉·凯瑟巧妙地将自身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中的重要部分投射在吉姆·伯丹、安东妮亚、莉娜、蒂妮等主要人物身上,既借助于对角色的描写寄托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与探察,也通过自身的投射使得人物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鲜活。当然,作者并没有把这些人物变成自己的影子,而是赋予了角色更加丰满的个性特征,为文学的画廊增添了新的、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

Abstract: Willa Cather projects herself onto the main characters in *My Antonia*, viz. Jim Burden, Antonia Shimerda, Lena Lingard and Tiny Soderball. In so doing the author successfully invigorate and animate the characters with her own features and traits, while retaining their richness and uniqueness of personal character by imbuing them with various other qualities. Her life experiences have been largely poured into the depiction of the narrator, Jim Burden, while her more womanly and feministic qualities manifest mainly on the persons of Antonia Shimerda, Lena Lingard and Tiny Soderball. In one of the cases Cather even successfully establishes a trinity among Jim Burden, Virgil and herself by a quote from Virgil.

关键词: 投射 生活经历 个性特征 人物形象

Key Words: projection life experiences personality character

威拉·凯瑟的小说一般都具有自传性质,而《我的安东妮亚》则是这些小说中自传性最强的作品之一。(Williams,1985:2)评论家一般认为《我的安东妮亚》一书做到了“艺术上的返璞归真”(Woodress,1970, Qtd. in Williams,1985:117),如同凯瑟自己所说,《我的安东妮亚》“没有爱情故事,没有感情的追求,没有婚姻,没有伤心,没有为了成功而拼命努力”(Interview 77, qtd. in Blackburn,2007:140),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作者所处时代的传统写作手法(Williams,39)。仔细读来,作者有意无意地将自身经历投射在小说的诸多人物身上,使得整部作品的艺术表现更加完美、精到。(Woodress,1970, qtd. in Williams 1985:117)

一、吉姆·伯丹

从生活经历上看,吉姆·伯丹与作者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以至评论家认为吉姆·伯丹就是作者威拉·凯瑟的化身,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年少时的威拉·凯瑟的确着意把自己装扮成男性形象,并因此而给人以“假小子”这样的印象。《我的安东妮亚》的文学导读中有如下评述:

作为叙述者,吉姆·伯丹是凯瑟的伪装——也就是说,吉姆是作为作者在书中的替身出现的。他来到内布拉斯加州的时间和年龄与凯瑟随其家人西迁时相仿;如同凯瑟一样,他与祖父母在农场住了一段时间;而吉姆的邻居雪默尔达一家人,可能是按照凯瑟的波希米亚邻居萨迪莱克一家(The Sadileks)的原型塑造的。成年的吉姆·伯丹回到了内布拉斯加,正如凯瑟成年后也回到过莱德克劳德镇一样。凯瑟回乡探访了她的朋友安妮·萨迪莱克,后者当时子女成群,婚姻生活也很幸福,其丈夫也是一位来自捷克的移民农民(书中的库扎克)。(笔者翻译)

非但如此,作者在生活经历上与吉姆·伯丹还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乘火车来到内布拉斯加州的;作者祖父母的家与吉姆祖父母的家极其相似;两人都与邻近的欧洲移民家庭交上了朋友;两人都曾经长时间离开这个州,居住于美国东部地区。由此看来,作者把吉姆·伯丹作为故事叙述者创造出来,难以避免地要赋予其作者的许多特征,因为描绘的是自己熟悉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上的风土人情,那么一个与自己在经历上比较相似的叙述者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性格特征上,吉姆·伯丹也与作者威拉·凯瑟有着许多相同、相似之处。也许两人最大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于乡土的热爱。生于斯长于斯,两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小时候两人都会骑着小马在大草原上游荡,到处欣赏草原的风景。成年后两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故土的热爱:吉姆·伯丹坐在火车车厢里在大草原上来回穿梭,并以促成年轻人在大草原上的创业计划的方式对草原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他怀着个人的深情热爱着他的铁路经过或正扩展支线通向那里的广大乡村”(166);威拉·凯瑟则以自己细腻的笔触抒写着早期大草原移民、草原人的生活经历及精神世界,为移民、为故乡立传,以文学的方式使得自己生活的时代与自己生活过的大草原变得不朽。

从这个角度出发,书中的一句拉丁语引文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注脚。在作品第三章第二节,吉姆·伯丹所读的维吉尔作品有一处引用:“Primus ego in patriam mecum ... deducam Musas.”作者给出了吉姆的导师加斯頓·克莱里克的英文释义:“For I shall be the first, if I live, to bring the Muse into my country.”“因为如果我能活着,我就要做第一个把美神带回家乡的人。”(笔者翻译)作者借吉姆之口解释说,这是克莱里克的一种愿望,希望能够把文学带回“自己小小的故土……父亲的……田地里”(335)。如果我们审视一下威拉·凯瑟的写作举动,会发现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凯瑟对自己写作意图的一种隐晦表达,因为到当时为止还没有人从移民的角度描绘过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她的写作行为正是要把文学这个“美神”带回自己所深爱的故土。

谈及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不回头看一下《我的安东妮亚》一书的导言部分。作者在这部

分中提到,《我的安东妮亚》一书的作者是吉姆·伯丹。这固然可以看成是威拉·凯瑟的一种巧妙安排,这样一来读者就只能“把该书作为业余作者的作品加以接受”,从而“使作者不用遵守(传统)的小说创作原则”(Williams, 1985: 38),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加以理解:吉姆·伯丹借着对安东妮亚的怀念与回忆,创作了这部作品,从而把“美神”带回了乡土。凯瑟借助于一段引文,实现了自身、小说叙述者和被引述者三位一体的隐喻,实现了在吉姆·伯丹身上的自身投射。

吉姆·伯丹与作者在心理上的相似之处还有他们共同的怀旧心态。事实上,弥漫全书,尤其是结尾部分的正是一种怀旧情绪。作品最后的“那不可言说的过去”,正是吉姆·伯丹留恋过去、难以面对未来的心情写照。无独有偶,威拉·凯瑟在20世纪20年代后逐渐成为了一个“落伍的人”。《新编美国文学史》中对凯瑟的评价是“专注于失去的事物,始终面对过去”(杨金才:232)。在《我的安东妮亚》一书的最后部分,我们看不到吉姆·伯丹对自己未来的全面谋划,所能感受的仅仅是他对自己儿时玩伴及其子女的亲近与留恋,这代表着吉姆·伯丹深重的怀旧意识,同时他的心态也是作者自身怀旧意识的真实反映。

在小说最后一章,吉姆·伯丹选择和安东妮亚的两个孩子一起睡草堆。这个举动看似不大,但自有其深意:吉姆下意识中还是把自己当成孩子看待,因而愿意与他童年玩伴的孩子同睡,希冀自己能够在这样的沟通和交流中找回童年的记忆,回味自己一生中最有乐趣的童年时代。事实上,由于婚姻的不幸,吉姆认为自己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大草原上和安东妮亚共度的童年时代。《我的安东妮亚》一书的文学导读中提到:

作为吉姆·伯丹的回忆录,这部小说重构了一位中年律师,其失败的婚姻使他找不到生活中的爱,倍感孤独,而这时回头看去,便觉得最快乐的童年时代成了一个富有潜力的时期,一个在成年时代的幻灭到来之前尚有期望的时期。(笔者翻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姆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个没有正常长大的孩子,婚姻并没有给他带来一般意义上的成熟,他始终如同孩童般单纯和浪漫,从导言部分说到他对于年轻人创业项目的热情就可见一斑。而当我们认真考察作者本人,就会发现凯瑟也是个选择不长大的孩子。凯瑟终生未婚,她自己的说法是“艺术和婚姻一般不能共存,因为艺术家必须成为艺术之神的‘人类贡品’”。而一般说来,中外的“人类贡品”多为孩童,因而可以认为凯瑟下意识地将自己作为孩子来看待。从这个角度来看,作者是把自已的孩童定位投射到故事的叙述者吉姆·伯丹身上去了。

不过作者并没有把吉姆当成自己完全的替代者来看待,毕竟性别不同,吉姆也有着自己的特质,如同文学导读中这样的评价:

吉姆并不仅仅是凯瑟的传声筒,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有着自己的天性和观点。尽管他敏感,有时喜欢幻想,并多少有点与所处的环境不能相容,却仍然是一个传统的青年,是他自身社会阶层和家庭抱负的产物。但是在他和安东妮亚之间造成隔阂的却绝不仅是阶级的差异。他有时被安东妮亚的意志力和活力所吸引,有时却又对她执拗倔强和敢说敢做的个性感到厌恶。人们在背后议论他,说他对于自己年龄和地位相符的女孩缺乏兴趣,却对那些移民的女儿们、做雇工的女孩们关系密切,这不正常。然而在他的祖母就此批评他之后,他就不再参加舞会,停止

了和这些女孩的来往。(笔者翻译)

在林肯市就读大学期间,吉姆开始了和莉娜·林加德的交往。然而在莉娜宣称自己永不嫁人的时候,他却毫无异议地接受了这个“声明”。回到了黑鹰镇,他听说了安东妮亚被拉里·多诺万抛弃的事。他对安东妮亚如此轻率地付出了自己的幸福感到困扰,同时也感受到了安东妮亚对他的重要性。然而他再一次离开了小镇。这一次他足足二十年没有再见到安东妮亚。二十年后再见的时候,吉姆见到了安东妮亚兴旺的大家庭,这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与婚姻是何等的贫瘠,而安东妮亚所代表的生命力又是如何旺盛。然而,尽管他对安东妮亚心怀爱慕,也想去亲近对方,他还是不能进一步深入安东妮亚的生活,仍然仅仅是一个抱有同情心的旁观者而已。

评论家一般认为吉姆是一个负面人物。布莱克伯恩(2007)总结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评论家眼中吉姆·伯丹的形象已经从过去的爱清静的、浪漫的回忆录作者转变为《我的安东妮亚》一书中事实上的反派角色:不可靠、不成熟,受压抑,又压抑着别人。(Blackburn, 2007:1)这样的形象显然和现实中的作者威拉·凯瑟截然不同,后者始终是一个“睿智、机敏又热心”的人(Bohlke, 1986:13)。

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被作者用来替代自身的书中角色,吉姆·伯丹不可避免地“承袭”了作者相当程度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不过威拉·凯瑟作为一位有着极高艺术造诣的小说家,不可能允许自己笔下的角色完全失去个性,因而吉姆的形象仍然有着独特的个性特色,从而超越了故事叙述者的单一身份,使小说的文学内涵得到了丰富。

二、安东妮亚·雪默尔达

《我的安东妮亚》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安东妮亚一般都认为是作者根据她年少时的邻居安妮·萨迪莱克的原型塑造的(Williams, 1985:2),并倾注了作者的深厚感情与艺术努力,成为了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不多见的、光彩的女性形象。虽然如此,细读之下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作者本人和她笔下的主人公之间的种种相似之处,可以说,安东妮亚身上不仅体现了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上早期东欧和北欧移民的诸多优秀品质,也曲折地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某些最核心、最本质的优秀特征,因而这个角色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非偶然,而是凝聚了作者艺术创作的巨大努力的。

前文曾经提到,生活中的凯瑟“睿智、机敏又热心”,而这些同样是安东妮亚的性格特点。正是因为安东妮亚有着这样的优秀品质,她才能够获得哈林太太的认可,才能够给伯丹一家及其后的寡妇斯戴文斯留下那样深刻的印象。然而凯瑟与安东妮亚最大的共同之处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她们共同的对土地的热爱和对于生命的热情。

小说中不止一次暗示安东妮亚是“大地母亲”(Williams, 1985:8, 104)的形象,尤其在第五章中这个意向的运用达到了高潮。安东妮亚所需要的是“婚姻、子女和一个农场”(ibid: 25),需要成为“一个有爱的家庭的一部分”,这其中就包含了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从幼小的时候开始,安东妮亚就和吉姆一起在大草原上漫游,虽然成年后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土地,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大地的怀抱,并且在大地的怀抱中获得了重生:她和库扎克结了婚,开拓了自己的农场,并在这个农场上生下了自己的一大群子女,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一些读者把安东妮亚比作“大地母亲”,因为她看上去代表了大地所具备的“生殖力、收获,以及与大

自然合一的和谐状态”(Williams, 1985:104)。

凯瑟同样在年少时热爱大地,同样骑着小马漫游过内布拉斯加大草原,同样在成年后离开了养育自己的土地,并试图在文学创作中尝试写作一些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场景,但她很快就醒悟过来,知道自己文学创作的根源还应该是在最熟悉、最亲切的大草原,在那片热土上的可亲可爱又可敬的移民身上。她接受了文学前辈裘威特的劝告,在文学创作上回归了自己熟谙的土地,实现了自己艺术创作上的一次“涅槃”。在离开故土多年后,她也回到了大草原,并在其后不断回到自己的故乡,不但为艺术创作寻找灵感,而且从中获取心灵的慰藉。由此看来,对于土地的热爱连接了作者和她笔下的主人公,对安东妮亚的描写也就成了作者自己寻求精神上的安宁与慰藉的一种下意识的手段。

当然,安东妮亚的生活原型毕竟不是作者本人,凯瑟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身的性格特征来安排精心塑造的核心人物。从表面看来,凯瑟一生未婚,这是作者和主人公的最大区别,然而两人的不同远不止于此。在凯瑟笔下,安东妮亚代表了某种现代文明向大自然、向欧洲文化传统的回归,这可能是凯瑟对于现代社会的一种痛定思痛的思考。凯瑟是一位被“时代的脉搏和场景的变革所纷扰、所侵蚀的作家”,“她十分留恋欧洲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及其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她的小说里,过多表现一种对已逝事物的眷恋和回忆”(杨金才:233)。由安东妮亚之父雪默尔达先生所代表的欧洲文化传统在他所最喜爱的女儿身上得以恢复,安东妮亚实现了的人生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欧洲文学传统中的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尽管在这田园中儿女成群,却不改其贴近自然、与世无争的理想特色。因而,凯瑟与安东妮亚最大的区别在于,安东妮亚是凯瑟文化理想、文化渊源回归的化身,而凯瑟本人则是典型的美国本土成长的公民,两者之间的不同不可以道里记。

三、莉娜·林加德和蒂妮·索特鲍尔

莉娜·林加德和蒂妮·索特鲍尔可以说是小说中的第二号、第三号女主角,所占戏份仅次于安东妮亚,并占据着重要的情节与不小的篇幅。莉娜和蒂妮的成长轨迹与威拉·凯瑟相比较之下,有着不小的相似之处:两位女性都不惧人言,终身不嫁,并且都在经过了曲折之后找到了自己事业上的成功模式,虽然这种成功之中不免有某些运气成分。莉娜在一个穷困、多子女的家庭出生、长大,来到小城镇之后因自己具有一定的天赋学到了制衣的手艺,并决定终身不嫁,投身于自己的事业。蒂妮的成功之路相对比较偶然,不过还是付出了一定的努力,同时也是终身未嫁,事业为先。在同一部作品中出现这么多的单身女性重要人物,这是很不寻常的。

从三人的成长轨迹来看,她们都经历了从农庄到小城镇,到小城市,再到大城市的曲折历程。也正因为有着这样一个不断拓宽眼界的移居过程,她们才能够找到真我,在现代社会的启蒙与教育下保持女性的独立与自尊,选择走上了终身独身、精诚事业的勇敢道路。

四、结语

在《我的安东妮亚》这部小说中,作者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的多个方面投射在了几个主要人物的身上。然而,作者并非没有选择、没有区别地加以对待,而是把自身性格

和生活、成长历程的不同方面恰如其分地投射给不同的人物,从而在突出主题的同时丰富了整部作品的艺术色彩,收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 [1] Blackburn, Timothy C. “‘Have I Changed So Much?’: Jim Burden,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Ending of *My Antonia*”, *Cather Studies*, 7.1 2007.
- [2] Bohlke Brent L. ed. *Willa Cather in Person: Interviews, Speeches, and Letter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 [3] Ching, Alison. “Understanding *O Pioneers!* and *My Antonia* (Book)”. *School Library Journal*, 49.1 Jan. 2003: 166.
- [4] Goggans, Jan. “Social (Re) Visioning in the Fields of *My Antonia*”, *Cather Studies*, 5.1, 2003: 153-172.
- [5] Holmes, Catherine D. “Jim Burde’s Lost Worlds: Exile in *My Antonia*”,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5.3 Fall 1999: 336.
- [6] “Literature Guide to *My Antonia*”, *Microsoft Encarta Encyclopaedia 2005*. Detroit: Microsoft, 2004.
- [7] Simons, Karen. “Re-making the Georgic Connection: Virgil and Cather’s *My Anton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7.4 Spring 2001: 523.
- [8] Williams, Liza M. *Willa Cather’s My Antonia (Barron’s Book Notes)*. New York: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1985.
- [9] 杨金才,《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0] 资中筠,《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湿地》中的哥特式元素和主题

任 战

摘 要: 格拉汉姆·斯威夫特的《湿地》写于对作家们纷纷在小说中思索过去、寻找身份的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对历史性质和真实性的探讨这一主题无疑是对那个时代精神的呼应。作者大量运用哥特式元素,结合意识流等创作手段,以形式上的炫目技巧有力地表达了主题。本文在概括小说创作的学术和思想背景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书中的哥特式元素及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于加强小说主题起到的作用。

Abstract: Graham Swift's *Waterland*, with its discussion about the verity and validity of History, echoes the intellectual spirit of his time.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Gothic elements in this novel reinforces its theme of hist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is novel and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its Gothic elements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form.

关键词: 哥特式 历史 后现代

Key Words: Gothic history postmodernism

—

1983 年,当格拉汉姆·斯威夫特(Graham Swift)出版他的第三部小说《湿地》(*Waterland*)时,他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关注历史的当代作家。

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曾将后现代作家的首要特征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元叙事,又被称为宏大叙事,讲述具有总结意义和普遍适用性的故事,指明历史进程的方向,使关于真理的陈述站得住脚。(Shaffer, 519)在卡茨文斯基(Donald P. Kaczvinsky)看来,《湿地》是“对宏大叙事的告别”,因为它讨论的是“历史的终结”,而小说的叙述者自己也承认,他没有办法区分传说和历史事实。书中,叙述者采取了一个貌似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追溯自己母系先人的沧桑往事,却又不不停地打断自己,思考着真相到底是什么和真相的多种可能性。正如哈琴(Linda Hutcheon)所说,我们找不到一个“对自己所了解的过去有把握的主体”(Hutcheon, 177)。这部小说中,叙述者对自己的没把握恰好与扉页的第一个引言呼应:希腊文 *Historia*: 2. A) 对过去事件的叙述。B) 任何形式的叙述:陈述、真实或虚构的故事^①。

^① 原文为: *Historia*: 2. a) a narrative of past events, history. b) any kind of narrative: account, tale, story.

《湿地》中历史和虚构间的边界很模糊,这个现象可以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氛围中找到源头,那是个流行把包括历史在内的所有东西都称为“虚构”的时期。贝尔贡济(Bernard Bergonzi)在“历史的虚构”一文中,分析了“最高虚构”这一概念的三个源头:一为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终结意识》,这本书讨论了虚构形式的性质;二是结构主义的稳步渗透,结构主义认为一切人类经验都建立在作为机制的语言之上;三是语言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的影响,特别是一本名为《现实的社会构建》^①的书,这本书颠覆了理性话语的可能性(Bradbury & Palmer, 43-44)。由此,当小说中的普莱斯说历史只是“童话”并质疑历史的意义、作用及我们是否需要历史时(Swift, 6),他的抱怨听上去似乎有些耳熟。对所谓历史“事实”的怀疑导致了对历史是否有用的不信任。正因为如此,普莱斯才会认为“重要的是此时和此地,而不是过去。是此时和此地——还有将来。”说这话的普莱斯出现在一本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书中,要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有了这么一场怀疑历史真实性和有效性的辩论了。当时流行的观点是,尽管历史学家总是尽可能力求客观,其个人情感和态度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影响他的叙述。那么,如果说历史和人类话语的其他形式一样,最终都是虚构的,“关于历史,我们无法说出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来,不管是支持、修正还是反驳;因为我们只是往虚构上面加虚构。”(Bradbury & Palmer, 44)这就把虚构普遍存在的观点推向了极端,也因此引起了包括维克多·萨奇(Victor Sage)和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内的批评家的反对。

我在此处提到这场论辩,并不是要加入论辩,就此问题发表个人看法,因为理论探讨不断发展向前,甚至将结构主义取而代之的后结构主义都早已不再新鲜;我的目的是为了强调:格拉汉姆·斯威夫特的这部小说,尽管形式上采取了令人目眩的实验手段,它的主题仍然只是对其诞生二十多年前那场辩论的继续和发展。在《湿地》中,普莱斯的立场是对最高虚构的激进支持,在他看来,既然历史是不确定的,索性不如将它完全抛弃。站在另一端的是汤姆·克里克,那位不断质疑自己的叙述者,那位正面临生活危机的历史老师,他试图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历史”辩护。在这一过程中,汤姆·克里克既和他的学生们辩论,又向他们吐露衷肠,时而推进叙述,时而又停下并转向,说一些离题的话,然后又回来,继续讲他的故事,上他的历史课。普莱斯的反驳促使他去思考,再思考。思考的结果怎么样呢?在第十章中,他承认:“解释历史是一件无法做到的事:因为它想要凭借不完全的知识来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做出描述,而那些事情也是在当事人知识不完全的情况下进行的。”(Swift, 108)由此来看,似乎克里克也没有信心能够说服学生,因为其实他自己也对历史有所怀疑。他并没有提供答案,相反,作为一个困惑的人,他在努力地靠近答案。他象征了那场围绕着历史性质的辩论。在书中,他不正是向学生们建议将历史学习看作一次探究吗?(Swift, 107)

斯威夫特不是唯一一位在新的理论和文学创作背景下对历史进行再思考的作家。在这篇文章一开始,我们提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元叙事的怀疑。斯坎兰(Margaret Scanlan)在她的“英国与爱尔兰小说中对历史的恢复”中,分析了产生这种怀疑的源头。在她看来,史学和文学理论领域的主要变化都反映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其中有两大重要人物:德里达和福柯。德里达曾说过“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写过了”,而福柯说过,“变革并不是由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观念带来的;变革产生于注意力和解释世界方法的逐步转移中。”这里的“解

^①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by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释”一词是否让我们想到了什么？这个词不正是在《湿地》中频繁出现的吗？比如在 108 页上，克里克说：“我告诉你们，通过不断地试着去解释，我们得到的并不是答案，而是知道我们解释的能力有限。”斯坎兰指出，福柯之后，对“历史的断裂和过去的他感”的认同不断增加，最终导致了对总是能够对历史或者人类行为提供全面解释的宏大叙事的不信任。（Shaffer, 145）她将格拉汉姆·斯威夫特与伊丽莎白·鲍温（Elizabeth Bowen）、穆丽尔·史帕克（Muriel Spark）、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拜厄特（A. S. Byatt）、伊安·麦柯伊万（Ian McEwan）、福尔斯（J. D. Fowles）放在一起，探讨了这几位作家在作品中重现历史的努力。在《现代英国小说》里，布拉德布里（Malcolm Bradbury）这样来称呼活跃在 1979 至 1989 年间的作家：漂浮世界里的艺术家们，以此来暗示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Bradbury, 447）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期，文学创作大范围地回归历史主题。（Shaffer, 212）查尔兹（Peter Childs）的“新千年到来之际小说中的‘英国遗产’主题和其他潮流”一文，使我们注意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一个趋势：通过对过去的审视寻求民族自豪感。这一时期历史主题的再度兴起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学家们在重新思考历史与叙事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与前殖民地作家相比，英国作家更需要构建民族身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格拉汉姆·斯威夫特创作这本同样以历史为主题的小说《湿地》，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它的出现也并非偶然；相反，它对作者所处时代的精神——也就是后现代精神，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在《后现代主义的政治》一书中，琳达·哈钦指出，“后现代似乎与一种普遍的文化认识相符，即对表达系统的存在及其力量的认识，而在一个特定社会里，这些表达系统虽然反映社会，却并不足以赋予它意义和价值。”卡茨文斯基（Donald P. Kaczvinsky）这样理解哈钦的观点：“在哈钦看来，后现代小说并没有拒绝历史，反倒是通过把人物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来积极地与历史发生联系；但同时，它们又颠覆了历史叙事的客观性。”（Shaffer, 519）我认为，把《湿地》这部小说与其创作的学术背景和文学思潮联系起来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历史主题。

二

阅读这本小说时，我们会在不止一个方面发现这部小说似曾相识。评论家们已经注意到并讨论了《湿地》中斯威夫特表现出的与狄更斯、福克纳、哈代和马尔维尔等人的文学联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文学联系值得我们注意：哥特式小说。尽管一些评论家，如卡茨文斯基，在做书评时将阿特金森家族——即汤姆·克里克的母系祖先——和克里克家族的故事或所谓家史称为“哥特式的家族史诗”，并指出了这本书中诸如谋杀、自杀、乱伦和巫术等哥特式要素，目前尚未有人将哥特式要素和小说的历史主题联系起来讨论。在我看来，《湿地》中的哥特式要素，不管是从构成小说的内容上来看，还是从表达形式上来看，都强化了这部小说对历史的讨论。

这部小说的情节有两个框架：现在和过去。在“现在”这个框架里，汤姆·克里克正面临着人生的危机：他的教师生涯和婚姻生活都在崩溃瓦解。当被学生们质疑历史是否有用时，他采取新的教学方法，转而讲述 1937 至 1943 年间自己年少时的经历。在这个框架中，他和他的妻子玛丽、上司刘易斯和学生普莱斯的交往构成了情节的主体。第二个框架，也就是“过去”框架，讲述了大约 40 年前他儿时的经历，主要的事件有一系列的死亡，包括他的

父母亨利·克里克和海伦·克里克、他的白痴哥哥迪克·克里克和好朋友弗莱蒂·帕尔,还有他和玛丽的情窦初开的性探索及后者的流产。第二个框架中另有一条线索:过去的过去发生的事情,也就是阿特金森家族的兴衰。两个主框架在玛丽最终精神失常这一情节上汇合。当然,这两个主要框架之间还穿插着诸如湿地排水等一些次要的叙述,但它们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重点。

尽管这部小说被称为“在时间中前后移动的意识流独白”(Stade & Goldstein, 434),“现在”框架中发生的事情基本上还是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口吻来叙述,而“过去”框架中的事情则笼罩在哥特气氛中。斯威夫特给这部小说罩上如此晦暗的色调并非随意为之,而且他自然也并不想让这本书变成一个惊悚故事。对哥特元素的应用既加强了小说的主题,又对作家所处时期的总体精神状态有所呼应。

开始讨论这部小说中哥特元素的应用之前,我们应该先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哥特?辞典上的解释十分清晰,但又不完全令人满意。《牛津简明文学学术语辞典》给“哥特式小说或哥特式传奇”作了如下定义:充满恐怖和悬念的故事,通常以阴暗的古城堡或修道院为背景。《牛津英国文学辞典》给出的定义为:哥特式小说是关于死亡、奇幻和超自然的故事,发生背景一般为闹鬼的城堡、墓地、废墟或自然景观奇绝的荒野之中。这两个定义的相似之处在于哥特式文学作品的背景,但它们都没能解释为什么当有些故事并不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却仍然叫它们哥特式这一情况。而且,仅仅把哥特式理解为恐怖和悬念的话,又无法把它与鬼故事或侦探故事区分开来。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全面的定义。

幸运的是,克莱斯·博尔迪克(Chris Baldick)的《牛津哥特故事集》给了我们启发。为这本故事集作序时,博尔迪克对哥特式故事作了简短但深入的总结,这一总结帮我们获得了关于“哥特”的更清晰的认识。在澄清建筑上的哥特式与文学上的哥特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混淆之后,博尔迪克追溯了这一说法的起源,并对其含义的逐渐变化作了简要说明。他还将哥特式与其他邻近类型的故事作了区分。(Baldick, xi-xxiii)他指出,哥特式本身蕴含着一种反哥特的精神,即“它本身根深蒂固地对中世纪文明不信任和它总是以暴政和迷信来表现过去”;而且,哥特式故事里总表现出某种对过去时代的执著想象。(Baldick, xiii)也就是说,哥特式故事的背景不一定非要是中世纪和城堡。博尔迪克认为,通过提炼最初哥特式背景的主要特征并把它们与发生在过去的残暴和破坏联系在一起,后来的作家们已经把哥特式变成了一种灵活的形式,并逐渐发展了完全不需要中世纪城堡的传统。所以,除了哥特式故事和哥特式小说之外,我们又有了一个新名词:哥特式效果。他引用了埃德加·爱伦·坡和威廉·福克纳的作品来阐释自己的观点。在下一个小节中,我们会讨论哥特式故事中的反哥特精神及它与《湿地》的具体联系。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部小说中的哥特元素。

先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为了给一部特定的故事集作序,博尔迪克讨论的重点集中在故事这一文学类型上,但小说毫无疑问也需要这些特点来达到哥特式效果。因此,博尔迪克的总结对于故事和小说来说都是适用的。他提出的模型为:时间上令人惧怕的继承感和空间上灾难般的封闭感相结合。换种说法就是:哥特式故事是在一个没有出路的封闭空间里讲述过去的暴行,“过去”的阴影如此沉重,使得“现在”都没有了希望。具体来说,文学传统上的哥特式可能包括下面一些元素:家族诅咒、残存下来的专制和迷信的古老形式、对男女主人公人身自由的威胁、锁住的房间及禁闭的大宅,等等。